

單元：面對未來：大環境篇

演講者：黃俊傑

題目：從 21 世紀新趨勢看大學教育的新課題

閱讀資料一：二十一世紀全球化時代的大學理念與大學教育：問題與對策

閱讀資料二：歷史激流中的大學教育與大學領導：台灣的經驗與啟示

二十一世紀全球化時代的大學理念與大學教育：問題與對策

黃俊傑

一、引言

人類歷史進入第三個千年紀元之後，戰後世界歷史主流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趨勢更加速發展。二十一世紀歷史的重要趨勢如高科技的發展、知識經濟的形成，以及文明之間的對話，都與「全球化」有關，而且直接衝擊大學理念與大學教育的轉型。

本文的主旨在於分析二十一世紀全球化時代中，大學理念與大學教育的新展望，特別針對（1）全球化時代的文化霸權與本土文化認同問題，以及（2）全球化時代中「教育主體性」的失落問題，籌謀對策。我們主張二十一世紀的大學教育應重視本土文化認同問題，加強本國文化教育，並回歸教育本位推動大學教育，才能在二十一世紀科技與經濟發展的洪流中，站穩教育的立場，開創新局。

在進入主題之前，我想先強調大學的「理念」及其「實踐」兩者之間，既有其不可分割性，又有其創造的緊張性。所謂「不可分割性」，是指任何大學的實際運作如果沒有清晰的理念，必然因缺乏指導原則而迷失方向。反之，大學理念卻也只有落實在具體的大學建制之中，才能使它自己充分實現；所謂「創造的緊張性」，是指大學理念有其理想性格，而大學教育有其現實面向，兩者之間在具體而特殊的時間與空間條件之中，常常不能免於緊張關係。但是這種緊張關係卻又深具創造性，因為高遠的大學之理念可以提昇大學的水準，而大學的實際教育狀況也可以使大學理念更具有方向感，兩者之間互為創造，合之雙美，離之兩傷。

二、全球化時代大學面對的新問題（一）：霸權文化與本土文化的爭衡

在二十一世紀新時代中，（1）「全球化」趨勢催化了「解民族化」與「解疆域化」的效應。（2）在「全球化」的衝擊之下，大學所面臨的第一個新挑戰，就是：

本土文化如何與強勢的霸權文化爭衡之問題。這個新挑戰使大學在「全球化」與「本土化」的激盪中進退失據，捉襟見肘。我們詳細闡釋以上這兩個論點。

（一）「全球化」的效應及其對大學的挑戰

「全球化」是二十世紀持續發展的現象，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蔚為歷史主流，最近二十年來隨著通信科技的飛躍發展，而成為二十一世紀人類社會的重要方向。「全球化」趨勢表現在許多具體現象之上，例如「時間」的全球化表現在全球各地股票金融市場的緊密互動之上，資本的全球化表現在全球各地資金之快速流動之上，知識的全球化表現在擁有新知識的人才之自由流動之上。但是，正如當代德國社會學家貝克（Ulrich Beck）所指出的，「全球化」趨勢的效應主要表現在兩方面：第一是所謂「解民族化」。貝克曾區分「第一次現代」與「第二次現代」，「第一次現代」的前提是「國家－政治對空間的固定和統治」，貝克說：¹

領土國家成了社會的貨櫃。換言之：國家的權力和控制要求建立且塑造了社會。對於民族國家在不同的基本權利、教育制度、社會政策、多黨政治風貌、財稅、語言、歷史、文學、交通路徑、基礎結構能量、護照和邊界管制等各方面的優勢地位，我們可以而且必須考慮和想像。藉此方式，民族國家社會也產生和保存了每日生活中的準本質認同，此種認同的自明性似乎建基於同義反覆的表達形式上：德國人生活在德國、日本人生活在日本、非洲人生活在非洲。在這樣的視野下，「黑色猶太人」和「西班牙德國人」（這僅僅是舉一些世界社會中十分平常的混雜狀態）被視為極端和例外，也就是被視為威脅。

在經濟、政治、生態、文化、生涯史的經濟全球化進程中，上述存在於國家社會空間和認同中的思想、行為和生活的建構崩潰了。世界社會意謂著，各種打破並攪亂政治和社會的民族國家正統性的權力機會、社會行動、生活和認知空間。

¹ 貝克著，孫治本譯：《全球化危機》（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9），頁 90-91。

貝克認為「全球化」趨勢所創造的「世界社會」意味著「第二次現代」的來臨，也意味著民族國家的終結，²他稱這種現象為「解民族化」。

「全球化」的第二種效應是所謂「解疆域化」。貝克說：³

全球化不能只被理解為民族國家間交互關係與作用的增強與頻繁，事實上，全球化持續改變了社會的內在性質：約定「社會」、「政治」之架構，本身就有了問題，因為疆域原則成了可疑的原則。更精確地說，假設的國家與社會等同關係被打破和解除了：越來越多的經濟和社會的貿易、工作和生活形式，不再於依國家原則組織起來的「社會容器」中進行。

因此，全球化的核心可被視為是社會的解疆域化。經濟、政治和生活形式不僅可跨越邊界威脅古老的民族國家，它們也改變了民族國家內部的凝聚狀態。越來越多的事情不但是同時發生，而且還發生於同一地，而我們의思想和行為未曾對距離的萎縮作出準備。世界突然變得緊密，不是因為人口的成長，而是因為某一些文化效應似乎必然會使所有的陌生者及遠方彼此接近。

貝克所謂的「解疆域化」的效應，確實出現在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等不同領域之中。這種「解疆域化」的作用，一方面使既有的國家、機構或團體的界限與支配力為之弱化，另一方面卻也使得世界各地的緊密感大大加強，使全球各地之間的互助支持愈形重要。⁴

但是，「全球化」趨勢所產生的以上這兩種效應，對二十一世紀的大學造成了巨大的衝擊，使世界各地大學的教育內容與品質都因捲入「全球化」的浪潮，而必

² 參考：Kenichi Ohmae, *The End of the Nation State: The Rise of Regional Economies* (New York: Mckinsey & Company, Inc, 1995)，中譯本：大前研一著，李宛容譯：《民族國家的終結：區域經濟的興起》（台北：立緒文化事業公司，1990），頁22。

³ 貝克：前引書，〈中文版序〉，頁4。

⁴ 所以，大前研一（日本），赫伯特·寒哲勒（Herbert Hensler）（西德）和佛瑞·葛律克（Fred Cluck）（美國），就在1990年2月8日在紐約舉行的貿易與競爭能力會議提出〈邁向2005年世界的互助互立宣言〉，強調：「人類社會與經濟制度，其安全之所繫，不再靠超級強國的嚇阻力量，而有賴於國與國之間經濟與知識思想上的互助互立」。這份宣言收入：Kenichi Ohmae, *The Borderless World* (New York: Mckinsey & Company Inc, 1990)，中譯本：黃柏祺譯：《無國界的世界》（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3），頁269-271。

須面對全球性的競爭。舉例言之，各國許多大學為了爭取「世界一流」的學術領導地位，常以重金禮聘著名學者前往任教，這種情況在若干全球競爭激烈的學術領域如半導體元件設計、基因體醫學、奈米科技等更是如此，由於這些領域中研究成果的突破可以創造巨大的商業利益，所以，世界著名大學莫不投入重金禮聘人才。其影響所及，遂使一流研究人才加速流動，因各國大學爭相延攬而奇貨可居。同樣地，各國大學為爭取第一流學生前往就讀，以厚植大學永續領導地位之基礎，也常以優厚獎金等條件，吸納青年學子。

那麼，在二十一世紀全球化時代大學競爭的語文工具是什麼呢？答案無疑地就是英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半個多世紀以來，英語的重要性與普及性隨著美國在政治、經濟、文化領域影響力的上昇而日益增加，冷戰結束以後更是如此。英語在生命科學與自然科學研究與教學中的重要性，已毋庸置疑，即使是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中的重要性也與日俱增。英語已經逐漸成為二十一世紀全球化時代中，大學學術研究的世界共通語言。提昇英語能力，已經成為非英語國家的大學基礎教育最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以後的海峽兩岸大學，莫不致力於學生英語能力的提昇。

在這種高等教育發展的新形勢之下，大學就必須面對以英語為基礎的西方霸權文化的宰制，以及如何在大學教育中延續本土學術文化命脈與傳承的問題。

（二）「全球化」與「本土化」激盪之下的大學教育

在「全球化」潮流之下，以英語為基礎的學術文化確實發揮了霸權文化的作用，影響所及，非英語國家的學術評量指標多以論文收錄在SCI (science citation index)、SSCI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或 A&HCI (art & humanity citation index) 之多寡，作為衡量學術表現的指標；本國人文社會科學中的某些學科之特殊的社會文化因素，以及以本國語言表達之方式，很少受到應有的考量。尤有進者，非英語國家之學者在英語學術典範的宰制之下，常運用西方（尤其是美國）的各種人文社會科學理論，對本國之人文社會問題進行檢證，於是，本國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遂淪

為西方理論之非西方註解。

在這種西方學術典範支配之下，非英語國家的大學教育也在「全球化」與「本土化」之間艱辛擺盪，甚至於輾轉呻吟。非英語國家的一流大學吸納全國的學術資源，培育出一批批的精英人才出國留學之後，大半滯留在英語先進國家而「為他人做嫁衣裳」。日積月累，使這些人才的母國處於長期失血的困境之中而不自知。從許多大學的實際情況看來，非英語國家的大學教育之「本土性」教育內容確實常常屈服於「全球性」的現實考量之下。

但是，我們必須接著強調：所謂「全球化」趨勢，在很多情況之下，實際上是經濟上的富國將其支配力擴張到全球各地的一種發展趨勢。這種經濟的富國大多是政治與軍事的強國，也是能源消耗最多的國家。這種國家控制國際性的銀行及金融體系如世界銀行（World Bank）及國際貨幣基金會（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簡稱IMF）等機構，也有能力主導國際性的資本市場，如號稱「經濟聯合國」的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簡稱WTO）。這種國家是高科技如資訊科技、航太工業、太空科技與生物醫學科技的領先國家，並且控制最先進的武器工業。這種國家常結合成為超國家聯盟，對其他國家進行干涉或侵略。於是，「全球化」趨勢常不免淪為為經濟及軍事的強國助長威勢的發展。在「全球化」的強力支配之下，弱國或窮國的大學教育常常不能免於在國際知識生產體系中，淪為下游知識工業的命運。這種地區或國家的大學教育對當地社會的貢獻不大，甚至完全背離本土關懷。

三、大學因應文化霸權挑戰的對策

我們在上節分析了「全球化」對大學的第一項新挑戰，那麼，我們應如何因應呢？因應這項新挑戰的對策甚多，（1）最有效的策略就是：大學基礎教育應厚植學生之本土文化根基，使其紮根本國文化，創造其本國文化資源，才能從本土邁向國際。這項策略之所以必要，乃是因為只有大學教育尋求本土文化的靈根自植，才能建立學生的文化主體性，並開拓學生的價值意識。（2）但是，這項教育策略也應避免流於文化的「部落主義」甚至文化的「自戀情結」。我們接著分析這兩項基本看

法。

（一）「全球化」中本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

正如上節所說，「全球化」趨勢其實對經濟的富國與軍事的強國大為有利，在多元文化競爭的表相之下，「全球化」助長了以英語為主的西方霸權文化在世界各地的影響力，其對非西方國家的大學教育的直接衝擊，就是造成這些國家的本土文化認同的薄弱化或流失，使學生成為文化上失根的蘭花或漂泊的浮萍。

針對上項教育問題，就海峽兩岸華人社會中的大學教育而言，我們必須在大學基礎教育中加強本國文化的教育，才能在二十一世紀「全球化」浪潮中各種文化系統激烈碰撞以及霸權文化強力宰制之下，奠定海峽兩岸中華青年的文化認同之基礎。為了達到這項目標，諸如「中華文化史」之類的課程在二十一世紀海峽兩岸大學基礎教育中，應特別加以重視。中華文化教育對二十一世紀海峽兩岸大學之所以是重要的基礎教育，乃是植根於歷史的不幸之中。讓我們從歷史的回顧說起。

在二十世紀的下半葉，中國大陸和台灣地區都經歷歷史性的劇變。就台灣地區而言，在戰後的經濟發展後，緊接著出現快速的政治民主化與社會自由化，促進了台灣快速的轉型；就中國大陸地區而言，經歷過文革十年動亂與浩劫之後，近二十多年來的改革開放政策，帶動了經濟（特別是沿海與江南地區）的快速發展，從而逐漸催化社會結構的轉變。海峽兩岸社會、經濟、政治的變化，必然影響未來中華文化的走向。二十一世紀海峽兩岸中華文化發展的方向何在？現階段雙方各自面對何種問題？應該如何因應？這些都是海峽兩岸知識份子與人民共同關心的重大課題。

二十世紀海峽兩岸文化發展的基本問題在於「斷裂」，所謂的「斷裂」有兩個涵意：(1)指文化領域與非文化領域之間的斷裂，而且前者的運作邏輯(*modus operandi*)受後者的運作邏輯的支配；(2)指文化領域內諸多組成要素之間的衝突。我們就海峽兩岸文化狀態加以探討：

從深層的文化史角度來看，台灣地區的文化發展仍潛藏許多問題，這些問題集中表現在：（1）文化領域與非文化領域之間的緊張關係：現階段台灣地區的文化的第一個問題是：由於戰後台灣經濟的快速發展，所導致文化領域的運作邏輯，深受經濟領域運作邏輯的支配與轉化。所謂「經濟領域內的運作邏輯」，是指在市場經濟的前題之上，以生產的效率作為基本考量。文化領域內部自己的運作邏輯應該在於文化理想之自我實現。文化領域的運作邏輯被經濟領域的市場經濟運作邏輯所掩蓋，造成文化領域自主性的喪失，其流弊所及導致文化創造力萎縮。（2）文化領域內部諸元素互相衝突：戰後台灣地區的文化內部還存在著諸多文化質素之間的衝突與不協調，主要表現為以下三類：第一是中原文化與台灣文化之間的不協調。第二是國際文化與本土文化之間的緊張。第三是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之間的對抗。以上三者之中，以第三項較具本質性，牽動前面二者的發展，其中中原文化與台灣地方文化之間的不協調，基本上是由於過去幾十年來政治結構與政策所導致；而國際文化與本土文化之間的緊張，則是與最近幾十年來台灣經濟的發展以及政治的民主化，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⁵

從台灣地區的現實狀況而言，由於資本主義的幽靈盤桓於寶島，所以我們看到台灣的文化領域與非文化領域之間也有一種緊張性，這就是文化領域受到非文化領域嚴重的宰制，一切事物都轉化成可計算可出售的商品。另外，文化領域之內諸多元素之間也有嚴重的衝突。

再從大陸地區的狀況來看，傳統中華文化在二十世紀的中國大陸也經歷翻天覆地的大變動。在1919年五四運動以後，中國開始走向思想層面的現代化。自1949年起，近代西方重要思潮之一的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大陸的官方主流思想。二十世紀中國大陸的文化發展呈現兩種問題：（1）文化領域與非文化領域之間的緊張關係：首先是從1949年以後，政治支配力量的高度突出，以致於文化領域的運作邏輯深受政治領域運作邏輯與價值體系的支配，文化為政治而服務，這種傾向在文化大革命

⁵ 參看：Stevan Harrell and Chun-chieh Huang, "Introduction Change and Contention in Taiwan's Cultural Scene", in Stevan Harrell and Chun-chieh Huang, eds., *Cultural Change in Postwar Taiwa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4), pp. 1-18.

期間表現得最為清楚。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在改革開放政策之下，市場經濟在大陸地區飛躍發展，逐漸取代政治力而成為支配文化領域發展另一股新興力量。大陸地區文化領域的自主性，在「改革開放」的新階段中仍呈現臣服於非文化領域支配之下的狀態。(2)文化領域內部的問題：近百年來大陸地區的文化發展，在文化領域內部表現為兩種形態的「斷裂」：第一是傳統與現代的斷裂；第二是中華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間的緊張性。這兩種類型的「斷裂」，在時間的進程中，交織為一，相互加強，使傳統中華文化在新舊交迭、中西衝突之中，艱苦備嘗。

從以上歷史的分析，我們可以知道：現階段海峽兩岸大學青年之所以與中華文化傳統產生強烈的疏離感，實在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在二十一世紀「全球化」浪潮席捲各地的新時代裡，海峽兩岸的大學教育更應加強中華傳統文化的教育，引導大學生躍入中華文化歷史的洪流中，汲取新時代的智慧的靈感，以便在二十一世紀各種多元文化價值的激流衝擊之中，建立自己的文化主體性，培養價值判斷的能力，成為有本有源、頂天立地的新青年。

再從二十一世紀大學的學術研究來看，中華傳統文化的教育與研究，也可以發揮極為巨大的學術能量。回顧二十世紀中國學術史，我們可以發現：二十世紀海峽兩岸中文社會科學界中研究有關「國家」(state)、「民間社會」(civil society)、「理性」(rationality)、「權力」(power)等議題的文化資源均來自西方經驗，而由於西方社會科學的支配性地位，將原是從具體而特殊的西方經驗中所建構的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推廣而成為普世性的學說。在這種推廣過程中，西方學術「典範」(paradigm)實居於霸權之地位。

展望未來，二十一世紀中文學術界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應該從西方支配走向東西互為主體。我們愈深入東亞歷史經驗與人文傳統，愈能夠出新解於陳編，愈能夠提出新的社會概念與命運，而與西方的同事進行富有啟發性的對話。中國學術如果愈能參考社會科學的概念與方法，就愈能夠開拓新的視野，社會科學與中國學術本來就應該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為了達到這項學術研究的理想目標，大學教育中加強有關中華文化傳統各個面向的教學與研究，實在是當務之急。

（二）「文化唯我論」的超越

我們以上所提倡的中華文化教育，不應被誤解為，我們有意鼓吹「文化唯我論」。所謂「文化唯我論」（**Cultural solipsism**）的心態，認為普天之下的不同文化系統中，以自己的文化最為先進而優越，其他文化皆落後而低劣，近代以前中國將四鄰形容為「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就是這種「文化唯我論」心態的表現。古代中國典籍中「中國」這個詞彙之涵義很能顯示我們在這裡所謂的「文化唯我論」，當代學者王爾敏（1927-）曾詳考先秦典籍中出現「中國」詞稱者共25種，歸納諸書所載「中國」詞稱之總數，共為178次，其所含意旨，約有5類：

（1）京師之意，凡9次。（2）國境之內之意，即所謂國中，凡17次。（3）諸夏之領域，凡145次。（4）中等之國之意，凡6次。（5）中央之國之意，凡1次。其中佔最大多數者，則為第三種以諸夏領域為範圍者，佔全部數量83%。其次指為國境之內者佔10%。再次指為京師者佔5%。王爾敏指出：「在秦漢統一以前，『中國』一詞所共喻之定義已十分明確，主要指稱諸夏之列邦，並包括其所活動之全部領域。至於此一稱謂之實際含義，則充分顯示民族文化一統觀念。諸夏列邦之冠以『中國』之統稱，主要在表明同一族類之性質與同一文化之教養之兩大特色。」⁶古代典籍以「中國」一詞指文化最高的諸夏之領域，「中國」一詞確實在相當程度內呈現某種「文化唯我論」的思想傾向。

我們現在提倡的中華文化教育，並不是以上述的「文化唯我論」作為基礎，也不是導向文化的「自戀情結」為目的。相反地，我們著眼於二十一世紀「全球化」發展浪潮中，非英語國家的文化傳統在英語霸權文化的沖刷之下，頗有瀕臨崩潰之危機，從而使得非英語社會的海峽兩岸華人社會中的青年，逐漸失去本土文化的認同感。我們的論述實有其特定之針對性，我們認為：提倡本土文化教育，必須超越狹隘的文化義和團心態，才能從深具地域特性的本土文化中，提煉具有普世意義的價值觀，使本國青年不致在霸權文化的衝擊中慘遭滅頂。

⁶ 王爾敏：〈「中國」名稱溯源及其近代詮釋〉，收入：氏著：《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台北：作者自印，1977），頁441-480，引用統計數字見頁442，引文見頁443。

四、全球化時代大學面對的新問題（二）：教育主體性的失落

全球化時代大學面對的第二項挑戰是：教育主體性受到嚴酷的壓抑或扭曲，因為（1）高科技的進步以及二十一世紀知識經濟的新發展，及其所產生的巨大利益，（2）使大學的性質產生重大變化，造成大學的「自我異化」，使大學之教育主體性日趨萎縮。我們接著論述這兩項論點。

（一）科技發展與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

二十一世紀是科技飛躍發展的時代，一般認為奈米科技、生命科學及通訊科技，是二十一世紀新科技的主流，世界各國莫不投入大量研發經費以加速在上述高科技領域爭取領先地位，以提昇國家經濟力。舉例言之，2001年哈佛大學宣布投入20億美金，針對幾個熱門領域建構五個研究中心，其中將7億美金建立Center for Genomics and Proteomics（CGP）及Center for Imaging and Mesoscale Structures，結合生物、化學、數理統計、電機資訊以及工程設計，發展新技術並用於大規模的分析基因及蛋白，以研究細胞及生理功能。此外，加州理工學院也投入10億美金，從事生物醫學相關領域研究。

在這種國際科技競爭的新潮流中，海峽兩岸也急起直追，台灣的國科會於2001年6月22日，正式核定「基因體醫學國家型科技計畫」，該計畫將分為基因體醫學組等四組，並從2002年度起執行三年，經費合計新台幣74億8千零7萬元。中國大陸從1997年開始推動973計畫，第一階段5年累計投入資金25億元人民幣，共有一百多個科研項目。973計畫2002年將再投入資金7億元，增加安排20個項目。973計畫的戰略定位是：根據到2010年以及本世紀中葉中國大陸經濟、社會和科技發展的目標和任務，圍繞農業、能源、信息、資源環境、人口與健康和材料等領域持續發展中的重大科學問題，開展創新研究。973計畫的108個項目，農業領域14項，能源領域12項，信息領域14項，資源環境領域19項，人口與健康領域17項，材料領域16項，重要科學前沿16項。

以上這種科技快速發展的新趨勢，說明了二十一世紀是一個所謂「知識經濟」的新時代。相對於過去歷史上以土地為生產工具的「農業經濟」，以及以資本與設備為生產工具的「工業經濟」，二十一世紀以知識作為創造及累積財富的工具，一般稱之為「知識經濟」。「知識」在二十一世紀成為創造財富的根本基礎，這裡所謂「知識」不僅包括科技研發的新知識，而且也包括經營、管理、傳播的新模式與新方法。

（二）大學的教育主體性面臨挑戰

以上所說的科技發展及其所創造的巨大的經濟利益，對大學所造成的衝擊在於：大學理念與大學教育必須因應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而有所調整。一位管理學家提出以下的觀察：⁷

在知識經濟時代，大學教育應從精英教育轉變成普及教育，因此大學教育的角色應從提供學生知識與技術轉變成營造有利人力投資環境者，把學生從被動性的學習轉為主動的人力資本投資者。要達成此目的，大學必須從開發各種不同才能方面著手，使看似很普通的學生透過各種才能的鑑定，發現他的特殊才能的所在，因而能因材施教，使大多數的就業人士都可以成為具創意、具專業知識與技術的知識工作者。大學經營的理念與方法亦該在知識經濟時代作一個徹底的改變，從一個被動的，以考試與頒發文憑的方式去迫使或檢驗學生有無學習得某些知識與技術，到一個主動的創造有利的誘因，提升學生從事人力資本投資的報酬，使他們從一個被動的知識接受者，到一個主動的新知識、新技術追求者，人力資本投資者。

這種說法完全切中知識經濟對大學之影響在於：使大學生成為新知識與技術的追求者與人力資本的投資者。大學的性質也隨之轉化成為知識經濟體系中新知識與新技

⁷ 李誠：〈高等教育在知識經濟時代的功能〉，收入：《知識經濟時代我國高等教育改革的理念與實踐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救國團社會研究院，2002），引文見頁20-21。

術的研發工廠。

就海峽兩岸大學教育的狀況而言，在二十世紀下半葉許多大學常扮演國家意識形態生產工廠的角色。相對於過去大學所肩負的意識形態任務而言，二十一世紀的大學轉化為新知識與新技術的研發工廠，雖然也許可以視為一種進步的現象，但是，如果從大學之為教育機構這個立場來看，則大學在二十世紀知識經濟時代中，將面臨「教育主體性」失落之危機。所謂「教育主體性」是指：教育的根本目的在於通過教育活動而促成學生人格之完整發展，從而增進學生之道德福祉。但是，在二十一世紀知識經濟當令的新時代裡，知識之商品化價值普受重視，有些人甚至以知識作為商品。於是，大學中知識的生產（如研究）與傳播活動（如教學活動），逐漸與這類活動之目標產生疏離現象。換言之，大學的教學與研究活動，由於知識經濟與市場需求等因素的介入與操弄，而演化成為大學教研目標的對立物。其結果是使大學終於與大學之目的互相疏離，而造成大學的「自我異化」，從而使大學成為完成其他目的（如市場經濟的擴張）的工具，使大學的「教育主體性」為之淪喪。

五、大學重建教育主體性的策略

針對上述第二項新挑戰，處於二十一世紀全球化時代的大學，（1）必須回歸並重建大學之教育主體性，才能消除大學的「異化」之危機。（2）大學挺立教育主體性的策略尤在於（a）將教學與研究之目標落實在學生之上，（b）並在大學社群與非大學社群之間建立「互為主體性」之關係。我們接著闡發以上兩項看法。

（一）大學「自我異化」危機之解消

我們要在二十一世紀全球化時代中，籌謀解消大學「自我異化」之對策，首先必須探討所謂「大學之自我異化」的具體涵義，約可從三個方面思考：

第一，所謂「大學之自我異化」，是指大學與大學師生心智勞動的成果互為疏離。舉例言之，大學師生研發的生物技術知識，一旦研發完成，這種知識就脫離其

心智勞動者，常經由知識商品化的管道，而流入大資本家所擁有的大藥廠，生產新藥，創造龐大商機。我們舉此一例以闡明：大學師生常常並不是他們心智勞動成果的最後受益人，在很多情況之下，大資本家比大學師生更能將大學的勞動成果加以商品化，從而壟斷其所創造的巨大利益。於是，大學乃出現「自我異化」。

第二，所謂「大學之自我異化」，是指大學通過其教研活動，而成為大學自身存在之本質的對立物。再舉上述生物科技為例說明。大學存在的本質是為了個人道德福祉的提昇與人類文明的創造與永續發展，但是，大學師生在大學中的教研活動，卻有可能將研究成果使用為毀滅人類福祉的工具，例如數年前台灣某大學畢業的藥學博士，在從事博士後研究時，使用教授的實驗室設備生產毒品，就是一個轟動社會的新聞。在上述情況之下，大學已疏離於大學的本質之外。

第三，所謂「大學之自我異化」，是指大學作為知識社群而與其他社群處於互為疏離之關係，而淪為被其他社群所宰制之狀態。大學本是大社會的一部分，大學與社會中其他社群或成員，應處於一種「互為主體性」的關係。從一方面看，大學既不是也不能成為遺世而獨立的象牙塔；但從另一方面，大學卻也不能完全受市場經濟的運作邏輯所宰制，而成為經濟部門的知識工廠。然而，在某些狀況之下，大學有可能淪為其他部門或社群之工具而「自我異化」。

針對以上所說三種意義下的「大學之自我異化」，其解消之方法在於使大學回歸以教育為本位之本質狀態。

（二）「教育主體性」的重建

所謂大學的「教育主體性」之重建，是指在二十一世紀知識經濟快速發展的新時代中，大學必須明辨本末，將教研工作之目標落實在學生之上。大學的研究成果固然可能創造龐大商機或新的意識形態，但是，大學存在之原初目的，並不是為了市場經濟的擴張或國家政治目標的完成。大學的教研工作都以學生心智與人格之成長為原初起點，也是最終目標。

如果大學能重建這個意義下的「教育主體性」，在二十一世紀新時代中，大學就有足夠的內在力量，以便與社會力、政治力及經濟力健康互動，雙方建立一種「互為主體性」之關係。誠如前任美國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校長都德斯塔（James J. Duderstadt）最近所說，二十一世紀是一個變遷快速的時代，各種社會、經濟、政治力量正強而有力地衝擊著大學的教學與研究的內容與議題。他以密西根大學為例，頗為擔心美國的一些研究型大學無法因應快速的經濟變遷而成功轉型。⁸就二十一世紀的大學來說，也許關鍵不在於大學是否能夠成功轉型以因應全球化與知識經濟的需求，而在於轉型後的大學是否能夠成功站穩「教育主體性」的立場，保持並延續大學的理念。

六、結論

本文扣緊二十一世紀全球化發展的新趨勢，探討新時代大學所面臨的兩項新挑戰，也以海峽兩岸的大學為例，提出因應挑戰的對策。我們在本文第二節首先指出：由於全球化的加速發展，二十一世紀以英語為中心的文化系統之影響力與日俱增，而逐漸形成具有宰制力的霸權文化，因此，二十一世紀非英語國家的大學必然面臨本土文化如何保存並發揚的問題。我們認為：在二十一世紀「全球化」愈加速發展，亞洲的大學教育愈應在基礎教育中加強本土文化的研習與傳承，才能厚植亞洲文化圈中大學生的本土文化資源，使他們在二十一世紀強勢文化的衝擊之下，不致形成為飄泊的靈魂或失根的蘭花。但是，我們也提醒，經由本土文化的浸潤而奠定學生的價值意識這項教育策略，並不意味著另一種形式的「文化自戀狂」教育，從而製造文化的或精神的義和團。我們認為：只有在「全球化」與「本土化」之間保持動態的平衡，亞洲國家的大學才能在二十一世紀植根本土並放眼世界，真正實踐「全球思考，在地行動」（“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的理想。

本文第四節分析二十一世紀全球化時代中，由於新科技如生命科學及奈米科技的突破，創造巨大的商機，使大學所創造的新知識之市場價值大幅提昇。這種新發

⁸ James J. Duderstadt, *A University for the 21st Centur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0.)

展的結果有可能顛覆大學的原始目標，改變大學作為追求真理的知識殿堂之性質，而造成大學的「自我異化」，使大學成為教育的對立物，使大學徹底「自我異化」。我們在本文第五節主張：二十一世紀的大學固然不應也不可能是遺世而獨立的象牙塔，大學師生不是不食人間煙火的隱士，但是大學卻也不是為了經濟創收而存在的利益共同體。二十一世紀的新大學必須與大學門牆以外的經濟部門，建構一種南宋大儒朱子（晦庵，1130-1200）所說的「不離不雜」的健康互動的「互為主體性」的關係。

※黃俊傑：〈二十一世紀全球化時代的大學理念與大學教育：問題與對策〉，收入《全球化時代大學通識教育的新挑戰》（高雄：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2004），第一章，頁1-24。

思考問題

- 1、 傳統東亞各國的書院教學以人格教育為基本精神，這種教育傳統是否有可能復活於今日全球化的時代？為什麼？
- 2、 您認為21世紀大中華圈的大學教育，應如何在「全球化」與「在地化」之間保持平衡？為什麼？
- 3、 在全球化時代裡，大學生在「作為國家公民」與「作為地球村居民」之間有其落差。（1）請分析造成這種落差的原因。（2）您認為這種落差能否克服？為什麼？

延伸閱讀

- 1、 黃俊傑：《轉型中的大學通識教育：理念、現況與展望》（高雄：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2006）。
- 2、 黃俊傑：《大學通識教育探索：臺灣經驗與啟示》（桃園：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2002）。

歷史激流中的大學教育與大學領導：台灣的經驗與啟示

黃俊傑

一、

20世紀末與21世紀初的台灣高等教育，正處於歷史的漩渦之中。這股歷史的漩渦由國內政治發展與國際高等教育的新形勢匯流相激相盪而形成，因果相逐，關係至為複雜。最近20年來，身處台灣歷史激流之中的高等教育工作者，身心都經歷並體驗了前蘇聯時代著名詩人、曾獲諾貝爾文學獎但慘遭迫害的巴斯特那克（Boris L. Pasternak, 1890-1960）在《齊瓦哥醫生》這部小說中所說的，我們每個人都經歷了兩次革命，一次是與他人共有的，一次是屬於自己的。近20年來台灣的大學教師，都經歷了一場教育的「寧靜革命」的風暴。在這場歷史風暴之中，每個人都經歷他自己獨有的，以及與他人共有的心路歷程。在風暴過後，未來高等教育這艘大船，將航向何方？這是身為船長的大學校長，以及作為水手的教師，心中時時刻刻縈懷的重大問題。

二、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強有力地沖刷著台灣高等教育的歷史潮流，分別來自（1）台灣內部快速的政治民主化，及其在大學校園所創造的機制、與氛圍與心態；（2）全球化趨勢、知識經濟（Knowledge-based economy）以及國際間高等教育競爭的白熱化。我們接著討論這兩種內外力量的激盪。

首先，1987年7月戒嚴令廢除之後的台灣，恍如鍋蓋一旦被掀開的壓力鍋，鍋內已經煮透爛熟的綠豆湯一湧而出，「教育」正是其中最耀眼的部門。後戒嚴時代的台灣高等教育，努力於掙脫過去之作為其他目的（如政治目標、經濟發展等）之手段之狀態，而回歸以教育作為教育的目的。用黑格爾（G.W.F. Hegel, 1770-1831）式的詞語來表達就是，從「教育在其自己」努力於走向「教育為其自己」。民國83（1984）年1月修訂的新《大學法》，就是當時時代氛圍下的產物。在「民主化」甚囂塵上的氛圍裡，「廣設高中大學」、「大學自主」、「教授治校」、「校長及各級主管普選產生」、「學生評鑑課程」等喊得震天價響的

口號，都是天經地義、不證自明的真理。

但是，從20年來台灣的大學院校的實踐經驗來檢證，所謂「校園民主」雖然矯正了過去威權時代諸多違反教育理念的弊病，如「政治力介入學術」、「政黨操弄學校人事」等，完成了（至少在形式上）「政黨退出校園」的理想，但是，不健康的「校園民主」，卻也創造了許多新的問題，舉其綦綦大者諸如經由普選產生的各級主管不能免於「政客化」之危機、教師難以免於「派系化」、職員在主管如走馬燈更迭的狀況下難以免於「騎牆化」，而學生在這種校園裡常成為教育的受害者。在不健全而單向的學生對課程進行評鑑的新制度之下，學生的角色已從「學習者」變成「消費者」，而老師則從教育者變成為「知識百貨公司的售貨員」。若干大學則從教育機構被扭曲成為營利事業，少數學校的教師如果當掉學生，會被校長責罵以影響學校招生；在一片火樹銀花、煙火綻放、熱鬧非凡的台灣高等教育界，有些大學出盡奇招以炫惑學生與家長，它們所提供的教育內容未必能喚醒學生生命的覺醒，但學生已經在「校園民主」或「產學合作」的浪濤裡慘遭滅頂，甚是可傷可痛。

更有甚者，隨著台灣的政黨惡鬥的加遽，大學校園成為意識形態的「殺戮戰場」（Armageddon，見《新約聖經》〈啟示錄〉，16:16），也常常不能免於政治力的拉扯與撕裂。在民主狂流席捲下的大學校園裡，校內許多重大教育事項常由臨時推舉或拉票產生的委員會決定，尤其少數強悍的委員常發揮主導作用，校長難以扮演領導之角色，而與校園外政商權力結構掛鉤愈深的教授，在校園內縱橫捭闔的空間愈大，大學的理念遂日益模糊，乃至隨風而逝。在高度「民主」的校園裡，各院系凡事訴諸投票，優點是院系自主性甚強，一切事務由該單位現任專職教師所決定，但流弊所及若干系所不免形同大學裡的封建諸侯國，校方難以干預院系之「自主」，所以，有的大學雖然以超高薪資延攬擁有四個「院士」頭銜的學者出任校長，也很難對校內「民主」架構有所撼動，遂使其上任之初所揭櫫的辦學理念難以全面落實。在《行政程序法》規範之下，校園內各種業務的處理幾乎動輒得咎。校內各單位、各委員會互相扞格的結果，使校內許多工作難以推動，有些大學的狀況就類似史學家黃仁宇筆下《萬曆十五年》所描寫大明帝國萬曆年間，從皇帝到平民百姓，人人都有無力感。校園之外，站在「民主」狂流中的政客隨時都以言詞、行動或政策傷害大學教育，並伺機攫取大學的靈魂。在

這種時代風潮之下，大學的領導人如果不能在狂風暴雨中站穩腳根，常常不能免於隨波逐流，終至人格「自我撕裂」、背叛教育理念，其事可哀，其情可憫！

在近二十年來「民主化」潮流中，「廣設大學」的口號催生了數量可觀的大學院校。教育主管當局在「民意」壓力之下，大量核定新學校的創設以及舊學校之升格改制，使台灣成為大學數量與容量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但在政府教育資源稀釋、教育品質下降以及「少子化」趨勢之下，教育主管當局又啟動大學評鑑與退場機制。在某種意義下，這些新設大學也是錯誤政策的受害者。

三、

其次，再從21世紀國際高等教育的大脈絡來看。從上世紀80年代以降，世界主要國家如德國、法國、美國、日本以及我國，都陸續推動教育改革，以因應全球化、知識經濟等新趨勢的發展。就大學教育而言，亞洲主要國家也從上世紀末開始聚焦特定學術領域，集中教育資源，以追求學術卓越，提昇國家競爭力，例如日本政府文科省推動“COEプログラム”（卓越研究中心計畫），南韓政府推動“BK 21”（21世紀韓國頭腦）計畫，大陸教育部推動「211工程」（在21世紀塑造100所世界一流大學），台灣從2000年開始推動「大學學術追求卓越計畫」（2000-04）、「研究型大學整合性研究中心計畫」（2002-05）以及2006年起開始實施的「邁向頂尖大學與研究中心計畫」（俗稱「五年五百億計畫」），在在都顯示國際高等教育競爭形勢之白熱化。

在上述國際高教競爭（尤其是人才競爭）的客觀形勢之下，台灣的大學院校更是自願或非自願地被捲入「全球化」、「知識經濟」與「資本主義化」的浪潮之中而難以自拔，其流弊所及使大學校長必須投入大量心力，發展政商關係以募款，而大學校園內愈能創造經濟利益的科系，愈能貢獻於狹義及短程的「國家競爭力」之提昇，因而這類系所所獲資源愈多，影響所及使大學終不能免於淪為資本主義社會中高科技研發工廠的命運。我們只要看看教育主管部門對頂尖大學的考核指標，對這種可能的發展傾向就可思過半矣！若干大學以培育21世紀領導人才為目標的特設學程，將學生送到政治人物或企業董事長辦公室見習，使學生提早接觸社會陰暗面，對於大學教育的淪落，也有推波助瀾之功！

四、

總而言之，21世紀台灣的大學教育的確處於歷史的激流之中，如果大學不能立定教育的腳根，使教育落實到喚醒學生生命的覺醒之上，那麼，各種投入龐大資源的偉大計畫，終將淪為莎士比亞所謂「結束的開始」（“The beginning of the end.”見*A Midsummer Night's Dream*, 5:1）。但是，如果大學師生在狂風暴雨中堅持「教育主體性」，讓大學教育回歸師生知識的成長與生命的成長，培育學生對社會的不公、不義的反省與批判能力，那麼，歷史的激流正可以轉化為新時代大學發展的新動力，使大學的靈魂重新甦醒，為大學教育開創新局！

※黃俊傑：〈歷史激流中的大學教育與大學領導〉，《通識在線》2008年1月號，第14期。

思考問題

- 1、傳統東亞各國的書院教學以人格教育為基本精神，這種教育傳統是否有可能復活於今日全球化的時代？為什麼？
- 2、您認為21世紀大中華圈的大學教育，應如何在「全球化」與「在地化」之間保持平衡？為什麼？
- 3、在全球化時代裡，大學生在「作為國家公民」與「作為地球村居民」之間有其落差。（1）請分析造成這種落差的原因。（2）您認為這種落差能否克服？為什麼？

延伸閱讀

- 1、黃俊傑：《轉型中的大學通識教育：理念、現況與展望》（高雄：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2006）。
- 2、黃俊傑：《大學通識教育探索：臺灣經驗與啟示》（桃園：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2002）。